

中国共产党 四川历史大事记

(1950-1978)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 四川历史大事记

(1950-1978)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年·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98/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
ISBN 7-220-04909-9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大事记-四川-1950—1998 IV. D235.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1369 号

ZHONGGUOGONGCHANDANG SICHUAN
LISHI DASHIJI

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写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叶 勇
邱云松
杨 潮
伍登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com>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6679239

印 刷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34

插 页

8

字 数

750 千

版 次

2000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200册

书 号

ISBN 7-220-04909-9/D·684

定 价

(全二册)软精:62.00元 硬精:68.00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中共四川历史大事记》编委会

主 任 卢 耸 岗

副主任 罗宗荣 龚自德

编 委 宁志一 刘文耀 刘建中 张继禄

周锐京 郭生春 赵庆东 彭亚新

主 编 宁志一



可贵的探索，曲折的道路

——1950到1978年党领导四川革命 和建设历史的回顾与思考

1950至1978年，是党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中共四川省委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全川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也给四川的工作带来了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对这一段历史作一认真的回顾和思考，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四川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多次强调要学习历史。他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无疑，响应江总书记的号召，在学习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的同时，结合学习新中国建立以来，四川党组织领导四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工业合作组织已达到 1.2 万个，有职工 40 万人，95% 以上的城镇手工业者参加了按行业组织起来的合作社。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经销代销，到个别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再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等步骤，由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发展到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全川解放后，各地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初步建立了国营企业，但比重不大。私营工商业户虽然大都规模很小，但数量很多，各地在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方针指导下，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使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1954 年 1 月，省委决定首先将 29 户大型私营工业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影响下，1956 年 1 月，重庆、成都、自贡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并在其后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全省 90% 以上的私营工商企业都实行了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不少企业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广大职工（包括不少资方人员）热情很高，纷纷改进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当然也同全国一样存在着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

从 1953 年起，国家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四川省也相应地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一五”期间，国家 156 项重点建设项目有 6 个安排在四川，694 项限额以上的项目有 16 个在四川。交通方面，继 1952 年成渝铁路通车后又建成了宝成铁路，“蜀道难”的状况开始改变。1957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47.5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5.5 倍。农业总产值 60.65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41%。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全省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75万吨，而人民解放军有60万人，公教人员和国营企业职工50万人，起义、投诚、被俘的国民党官兵90万人。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如果不好好解决这两百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势必大乱。”大批解放军官兵和地方干部组成征粮工作队，分赴农村征粮。征粮工作受到了土匪暴乱的严重影响。为扭转这一局面，各地将征粮与剿匪紧密结合起来，随着剿匪斗争的胜利，征粮工作的局面也逐步打开。1950年秋收以后，征粮任务胜利完成。全川公粮入库数约为200万吨。全川外调大米7.5万吨支援上海、华东等地，并且供应进军西藏部队的粮食共计5.5万吨。

在抓紧进行征粮剿匪的同时，在城市开展了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的斗争；在农村展开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这一系列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四川展开。四川农村土地集中程度为全国之冠，由于四川农村严重的封闭性，封建经济关系特别牢固，实行土地改革的任务更为艰巨。到1952年9月，四川全境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约57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历史任务，共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田地5700多万亩，分给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1952年上半年，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在城市工商业中进行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同时，集中力量进行了统一财政经济的工作。到1952年底，全川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任务，工农业生产除个别产品外都超过了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为了适应国家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建设的需要，确保第一个



五年计划的执行，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1952年9月1日，由原来的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政区合并成立四川省。中共四川省委同时成立。1954年7月1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中央所辖的重庆市，改为四川省省辖市。1955年10月1日，中央决定西康省和四川省两省合并，西康省所辖金沙江以东的各地（州）、县划归四川省建制。四川省的地域格局自此定型，一直到1997年重庆市改由中央直辖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

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后，即紧紧抓住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中心，开展“一化三改造”工作。四川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全国一样，也经历了建立互助组、建立初级社再到建立高级社三个阶段。1952年12月，省委制定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五年发展计划。1955年秋后，农业合作化走向高潮，到1956年10月，全省已有17万个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8%，基本上实现了对四川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的实现，对四川的农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全局都有着长远的影响。当然农业合作化的后期，在反“右倾保守”的政治气氛下，发展过于迅猛，工作有些粗糙，造成了不少遗留问题。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走合作化的道路。四川手工业历史悠久，广大手工业劳动者，利用地方资源，制造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但传统的手工业分散、封闭，设备简陋，技术落后，部分手工业组织内部还存在封建的生产关系。1951年，四川就已开始通过典型示范对手工业进行改造。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兴起，手工业合作化也加快了步伐。1956年底，全省手



工业合作组织已达到 1.2 万个，有职工 40 万人，95% 以上的城镇手工业者参加了按行业组织起来的合作社。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经销代销，到个别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再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等步骤，由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发展到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全川解放后，各地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初步建立了国营企业，但比重不大。私营工商业户虽然大都规模很小，但数量很多，各地在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方针指导下，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使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1954 年 1 月，省委决定首先将 29 户大型私营工业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影响下，1956 年 1 月，重庆、成都、自贡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并在其后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全省 90% 以上的私营工商企业都实行了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不少企业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广大职工（包括不少资方人员）热情很高，纷纷改进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当然也同全国一样存在着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

从 1953 年起，国家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四川省也相应地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一五”期间，国家 156 项重点建设项目有 6 个安排在四川，694 项限额以上的项目有 16 个在四川。交通方面，继 1952 年成渝铁路通车后又建成了宝成铁路，“蜀道难”的状况开始改变。1957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47.5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5.5 倍。农业总产值 60.65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41%。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全省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这几年中，省委还进行了一项重要而又特殊的工作，即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农牧业合作化。四川少数民族虽然在全省总人口中的比重不大，但聚居地区却占全省总面积的 57% 左右。1955 年秋开始在甘孜、阿坝、凉山三个自治州进行民主改革。这项民主改革，既有阶级斗争的一面，又有民族关系和宗教影响的一面。经过艰难的工作，并平息了少数奴隶主、农奴主的武装叛乱，民主改革取得了胜利，延续千年的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度被摧毁，基本生产资料回到了劳动人民手中。当民主改革完成之时，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直接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使这些地区农牧业合作化的进程较之内地更为急速。在合作化的过程中，省委给予了少数民族人民很大的帮助，许多地方免除了农业税，无偿拨给合作组织生产资金，发放扶贫资金，引进农牧业机械，帮助改进生产技术。1958 年全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区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2.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四川省各级党组织，领导全省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建设热情和创造精神，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四川，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然，由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认识不足，以及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失误，也给四川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带来重大的损失。

在党的“八大”制定的战略方针指引下，四川各级党组织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使 1957 年成为四川经济工作最



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反击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但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四川4万多名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员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打断了四川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进程。“大跃进”运动开始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在工农业生产战线上严重泛滥。钢、粮指标一再加码，“全民大干”风起云涌。仅1958年，四川全省近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小高炉遍地开花，造成生产资料和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与生产建设“大跃进”的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也迅速开展。1958年8至9月间不到40天时间，全省原来16万多个农业社一下子改造成了4821个人民公社，实现了公社化。农村中建立了61万个公共食堂，95%的社员在食堂吃饭，共产风迅速刮遍全省。“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四川的经济遭受严重的挫折。

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省委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指示，曾经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不少干部、群众从本地实际出发，努力探索恢复经济的办法，许多地方出现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试验。庐山会议以后，在全国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中，四川省也批判了一批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断了纠“左”的进程。1960年2月，省委根据中央继续“大跃进”的精神，提出了“全党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为实现1960年的大跃进而奋斗”的口号，全省基本建设再度膨胀，各项工业生产指标居高不下。而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减13%，粮食产量递减20%。由于严重缺粮，城乡出现浮肿病，农村出现人口大量



非正常死亡现象。

尽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经济实力一度急剧衰落，但当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投入的巨额资金和劳力，终究为后来经济的重新发展形成了一些物质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省在1959年到1961年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本省严重缺粮的情况下，根据中央的指示，仍然调出粮食615万吨支援京、津、沪和其他省区，四川人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针对严峻的经济形势，1960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1月，四川省、地、县及一些重要企业的领导干部500余人出席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他们在会上反映了许多真实情况，省委的主要领导在四川组的会议上作了检讨。七千人大会后，省委进一步认清了严峻的经济形势，坚定地领导四川的调整工作。首先，为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错误批判的38万干部、群众甄别平反。其次，坚定地把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停办公共食堂。与此同时，不少的社队自发搞起包产到户。第三，贯彻《工业七十条》，进一步精简城镇人口、压缩基本建设战线。省委决定，除重点工业部门和骨干工业较多的地区外，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城镇人口要压缩到低于和接近1957年的水平。1962年底，经济调整胜利完成。从1963年开始，四川经济迅速复苏。

1964年，党中央作出进行大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四川作为大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之一，要求建设起国防科技工业、常规兵器工业、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燃料动力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基地。为了适应工业建设和国防的需要，四川相继



开始修筑成昆铁路、襄渝铁路等铁路干线。

根据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扩大化的估计和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从1963年底开始在全省农村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简称“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开展前后，文艺界开始整风，一些文艺工作者受到批判。在教育界，一批教师在“四清”中被当做“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公职。到1965年中央制定和下发了“二十三条”，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左”倾错误有了进一步发展。这实际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3. “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动乱中，四川是全国有名的“重灾区”之一。“文化大革命”中，四川武斗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全国罕见。全省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一方面不得不执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示；另一方面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抵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所支持的刘结挺、张西挺等人在四川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减少了损失，而且“文化大革命”后期，四川的经济建设，主要是三线建设，还有新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初期，四川和全国一样，主要是进行所谓的破“四旧”。省委向大专院校、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代替已瘫痪的学校党委领导运动。到1967年1月，在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下，动乱发展到工矿企业、农村。各种群



众组织纷纷建立。各级党政领导被揪斗，各级党政机关被夺权，省级及其以下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并开始出现少数“造反派”和绝大多数群众即所谓“保守派”的对立和斗争。1967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错误地把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定为“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由此牵连并打倒了一大批领导干部。不少地区由于帮派斗争发展到严重武斗，甚至“武装割据”；工业企业、基本建设战线不少单位停工停产，农业生产下降；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1969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对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报告》作出批示（即“一二二五批示”），决定成立四川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成立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和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四川代表宣布“一二二五批示”时指出，四川问题要迅速解决，不能再拖了。此后，四川揭露和批判了刘结挺、张西挺的严重错误，形势逐步好转。

1971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并成立了第二届中共四川省委员会。在此前后，各市、地、州和县各级党的领导机构重新建立。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组织也陆续重新建立。党组织的重新建立和党员恢复组织生活以及一大批有实践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四川动乱形势有所好转。“九一三事件”后，全省清查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还开展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在经济上重点抓了三线建设，成昆铁路全线实现通车，攀钢一号高炉建成出铁，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也在加



紧建设。农业方面，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主要兴建了4个大型骨干工程，即玉溪河引水工程、黑龙滩水库、龙泉山引水工程、人民渠七期工程。从1970年到1973年，四川省的工农业生产又开始逐年恢复和回升。

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省委和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邓小平关于整顿的思想，做了大量的工作，形势明显好转。1975年7月，邓小平在同省委主要负责人谈话时，着重强调了四川要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指出四川没有肉吃，没有菜吃，到很远地方去拉菜，就不安定。邓小平的谈话，对于当时推动全省各级干部抓经济工作，特别是抓农业，起了重要的作用。省委调整和加强了各级管农业的领导班子，在抓化肥生产，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改田改土，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以及积极办好“五小”工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扭转了1974年农业生产受批林批孔运动破坏而下降的局面。在工业交通方面，四川配合铁道部对铁路运输进行了整顿，随着铁路运输的好转，整个工业生产逐步扭转了停滞不前的局面。与此同时，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经过整顿也都有了新的进展。1975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53.68亿元，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四川的最高纪录。

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也席卷全省。四川的几个帮派头目为了搞乱成都以及整个四川的形势，多次大闹省委召开的会议，聚众冲击成都市委并“进驻”省委机关；在成都街头制造流血事件；挟持省委领导到北京，要求中央改组中共四川省委；不少单位的帮派分子公开伸手要“官票”、“党票”，挑起事端，破坏生产。省委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党员和广大群众，对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斗争。1976年4月四川人民以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充分表达了拥护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强烈愿望。

4. 徘徊中前进和走向伟大转折

粉碎“四人帮”后，全省人民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清算极“左”路线和“四人帮”的罪行，摧毁“四人帮”在四川培植的帮派体系，肃清派性影响，实现安定团结，从而为恢复、振兴经济和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创造条件。在这方面，省委和各级党委做了大量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全省就实现了由乱到治。

省委连续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号召全省干部、群众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查清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1977年9月6日，省委召开了深揭狠批刘结挺、张西挺罪行的大会，全省各地分设会场641个，参加大会的达1000多万人，大会把粉碎“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斗争推向了高潮。清查工作到1978年6月基本结束。

在清除混进各级领导班子里的帮派骨干分子之后，省委在1978年又继续对县级以上的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更加深入细致的整顿。以思想整顿为主，着重进行坚持无产阶级党性，清除资产阶级派性的教育，解决振作精神，敢于敢治的问题。同时进行了必要的组织整顿，调整部分领导班子成员。两年中，有730多名干部被提升担任副县级以上的领导职务，使各级领导班子加强了力量，提高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在这期间，平反了部分



冤、假、错案，落实了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调动了干部和群众及各界人士的积极性。

四川由于粮食减产，1976年不得不从东北等几个省调进51万吨粮食，安排人民生活。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把农业搞上去，成为当时经济工作的迫切任务。省委决定在经济工作中首先打好农业翻身仗。针对四川盆地冬暖春早和肥料、水利条件，提出四川的基本耕作制度是稻麦一年两熟制，解决了长期以来强迫农民种双季稻的问题。使农业生产取得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因地制宜改变生产技术的同时，又着手改变“左”的经济政策。在1977年春，规定农村当年分配要做到增产增收，多劳多得，分配兑现，让社员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1978年2月1日，邓小平来四川，指示要清理各方面的政策。省委规定了12条农村政策，主要是加强劳动管理，严格财务管理制度，坚决保证社员分配兑现，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积极兴办社队企业，在保证集体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等。

在工业生产方面，1976年下半年，四川约有一半的工厂停产或半停产，地方工业的亏损面竟达58%。省委认真抓了工业交通企业的“揭、批、查”运动，整顿加强了领导班子，使干部和工人精神振奋，生产积极性高涨，放开手脚搞生产，不仅停工停产的企业迅速开工，而且各个企业的生产形势日益好转。许多企业开始实行了奖金制度，建立起了正常的生产与工作秩序。1978年工业总产值达到了222.16亿元，比1976年增长了64%，高于全国增长幅度。

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78年3